

“90后”阎崇年：做任何事都要“善始善终”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曾告诉学生阎崇年，历史不能光在书斋里研究，更要把历史还给群众，要注重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如今，90岁的阎崇年从事清史研究超过60年，他被更多普通人认识，是因为20年前，他初次登台央视《百家讲坛》讲《清十二帝疑案》，就让收视率破了纪录。《清十二帝疑案》的讲稿后来汇编修订为《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20年来有了18个不同版本，重印约60次，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

近日，在一场题为《我与清史研究》的讲座中，阎崇年首次系统回顾了自己研究清史的历程。

29岁开启清史研究之路

1934年4月24日，阎崇年出生于山东蓬莱的一个渔民家庭，在村子里生活到15岁，后随父母举家搬迁到北京，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以清史闻名，但其实阎崇年最初想研究的是先秦史。“当时北师大历史系的杨钊教授，先秦讲得特别好，诸子百家的原话，成段成段地在课堂上背。我真佩服，也想学。于是找了书，白天看晚上看，平常看周末看，看了3年，有了一些感想，就开始写一些小文章。”

自己写得到底怎么样，阎崇年心里没底，于是经人介绍，到北京的干面胡同拜访刚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历史大家杨向奎。“见了面，杨先生特别客气，说写得很好，找个杂志发表一下吧。我当时想，年轻人发表论文那么

难，我上哪儿发去，就回去了。”

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杨向奎专门给阎崇年写了一封信，说先秦的考古发掘不在北京，你只能看二手资料，你应该研究清史。明清的宫廷档案、重要的古典文献，都在北京，而且当时研究清史的人很少，还是一块处女地。

“这些话对我刺激太大了。我当时一个月什么都没干，就在想，到底学什么。”阎崇年说，“年轻的朋友请记住，当你选择一个方向、确定一条道路的时候，一定要慎始善终。”29岁的阎崇年最终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了。从1963年至今，他始终专注于清史研究。

花费20年心血完成一本书

下定决心研究清史后，阎崇年最初以康熙为切入点，但始终感觉不得要领，“八旗制度怎么回事，爱新觉罗最初姓什么…都搞不清楚”。在迷茫中，阎崇年到北师大历史系主任白寿彝家中求教。

“白先生告诉我，树有根，水有源，研究历史一定要从它的根和源上入手。清朝历史的根和源，当然在关外。”阎崇年一下子豁然开朗，转到对清开国史的研究。198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努尔哈赤传》。这也是世界学术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努尔哈赤的著作，成为后学绕不开的经典。

其间还有一件轶事。总是在方向问题走岔路的阎崇年，这回“学乖”了，在研究努尔哈赤前，先向白寿彝求教。“白先生忙，老不在家，就让我饭点去

他家找他，师母给我盛饭，我每次就一边吃一边说。”得到白寿彝认可和鼓励后，从1963年到1973年，整整十年，阎崇年完全看原始资料，成就了这篇论文。

而从论文到出书，又是十年。

“我敢说，与努尔哈赤有关的，中国的、朝鲜的、日本的、明朝的、清朝的、韩文的、满文的，我全部看过。”阎崇年说，这大概就是国学大师王国维讲的做学问的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做学问就像唱京剧

20世纪80年代初，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阎崇年，需要撰写与北京相关的论文。他结合自己对清朝开国史的积累，选定了袁崇焕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袁崇焕刚好处于明史、清史、北京史的交叉地带。2023年，《阎崇年史学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就包含明史、清史、故宫史、北京史、满学五大领域的97篇论文，充分显示了阎崇年的“博与专”。

在阎崇年看来，做学问就像唱京剧：“梅兰芳先生讲过，学戏一开始会得少，后来多，最后又少，这就是精。做学问背后的要诀是追求‘约一博一通’。把一个小小的点掌握扎实，然后吸收大量材料，经过沉淀、积累，上升一个境界，最后剩下的才是精华。”

但能坚持到最后、走到“通”的人少之又少。阎崇年就是那个能坚持的人，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其他。

阎崇年津津乐道80岁时第一次去布达拉宫的经历：“当时家人朋友都说不行，出事怎么办，但我铁了心，谁也拦不住。海拔3800米，我上去了，也不晕。当地的朋友见我状态不错，就说，既然来了，要不再去趟日喀则、阿里。我说不行，得见好就收，于是安安全全回到北京。”阎崇年相信，作为历史学者，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中国最北的漠河，到最南的三沙市，从东边的日照到西边的霍尔果斯，我都去过，我还见过曾母暗沙”。见多了实实在在的风景，阎崇年发现，东北的满族是森林文化，并非草原文化，并于2018年出版了《森林帝国》一书。这也是中外史学界第一次提出“森林文化”的概念。

阎崇年把对待事业的态度归纳为“敬、诚、淡、静”4个字。他把“敬”排在第一位，“敬就是爱，如果不用敬字对待自己的专业，就不能人其门”；第二是“诚”，历史要求真，而“诚”是求真的基础；第三是“淡”，要淡泊名利，才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最后是“静”，只有静，才能把一个领域做长久。他鼓励年轻人要静下心来做事，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再笨也会做出一点成绩，“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阎崇年说，自己很幸运，90岁了仍然生活自理，尽管体力不比年轻时候，但一周仍工作7天，“我还是尽我的力量，学者就像蜜蜂采了花粉，酿成蜜献给人间”。去年，他有45本书在不同出版社出版，他希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据《中国青年报》蒋肖斌/文

欧洲人曾想方设法来华“采花”

1698年，英国一艘商船在中国厦门靠岸，一个名叫詹姆斯·昆宁汉姆的男人走了下来。他此行的公开身份是随船医生，但还背负了一项秘密的特殊任务。昆宁汉姆一下船就跑到厦门乡间和鼓浪屿海岛上。他蹲在百花丛中，收集菊花、苔藓甚至杂草，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随身携带的小口袋里。

自从15世纪新航线被开辟后，满载丝绸、瓷器和茶叶的商船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回到欧洲。梅花、玉兰、茶花、牡丹这些中国的花卉图案也随之进入欧洲贵族视野。那些花瓣卷曲的菊花、层层叠叠的牡丹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只是东方人的一种想象。他们认为这些造型奇特的花卉根本不可能存在。

不过，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很快证明了这些植物的存在，比如“以玫瑰但又无刺，有白色、紫色，时也可见红色和黄色”的牡丹，还有“色似蜜蜡，香气怡人”的蜡梅。这让欧洲的植物爱好者们兴奋不已。他们渴望拥有这些植物的种子，更希望这些花卉有朝一日能长在自己的花圃中。热衷于收集异域植物的外科医生昆宁汉姆成为他们之中的第一个“采花大盗”。

昆宁汉姆像做手术一样，精确地切下每种带叶植物的枝或茎，留下花和果实，放入采集袋。每种植物他都采集了两到三个标本。返回船上后，他将植物样本干燥后夹入书页。他还为这些标本制作标签，注明其在医学方面的应用价值。昆宁汉姆带回

去的标本让同行欣喜若狂。如今，它们珍藏于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

昆宁汉姆结束采花重任几十年后，石竹、翠竹等观赏植物开始出现在欧洲庭院中。植物爱好者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想获得更多的种子，于是开始向传教士求助。

汤执中就是这些传教士中的一位。他生于法国，被派往中国传教前，他向巴黎皇家植物园园长承诺，尽可能多地寄回植物种子。然而，1748年，传教士与清廷关系恶化，他们只被允许进行短途旅行，即使前往郊外的法国公墓，也必须有人随行，并且沿途不能下马。汤执中只能让仆人帮他采集想要的植物。为了兑现承诺，汤执中想了很多办法，包括用葡萄牙烟草与中国人换植物，以及向清朝皇帝进献西方奇异花草来博取好感。

1753年，汤执中向乾隆皇帝进献了两株含羞草，这是他从法国带来的种子，在中国培育而成。乾隆非常喜欢这种西洋植物，还让宫廷画师为它们画像。第二年，汤执中就被允许在皇家园林中收集植物种子。

随后，汤执中将收集的种子送往欧洲。臭椿、银杏等植物都是这一时期由他引入西方的。1757年，汤执中因病去世，欧洲人在中国园林采集植物的特许权利也随即终止。然而，到中国采花的旅程没有就此结束。如今，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温带地区都会看到至少一种来自中国原产的观赏性植物。

据《老年文汇报》

